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浅析智能时代制海权发展走向

■庄从勇

引言

作为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课题,制海权内涵随着海上战争实践不断丰富发展。美国海权学派奠基人马汉通过对帆船舰队时代、风帆舰队时代以及早期蒸汽铁甲舰队时代欧洲海上战争历史

地位作用:从“制约战局”向“塑造格局+”升级

关于制海权的地位作用,马汉虽然表达了“控制了海洋就控制了世界”的观点,但其主要认识还局限于“制海权对赢得战争胜利至关重要”层面,没有看到制海权对地区乃至国际战略格局的深刻影响。事实上,制海权对于欧洲格局塑造的影响在16至18世纪的海上战争中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在太平洋海战中战胜日本,在大西洋策应盟军赢得大西洋海战,一跃成为世界海洋强国,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战后的冷战格局。

当今世界大国战略竞争日趋激烈,地区冲突连绵不断,国际力量对比正发生深刻变化。传统海洋强国视海洋为固有领地,企图通过控制海洋进而维护全球霸主地位。新兴国家为了打破传统海洋强国在海洋方向的围堵遏制,必须拥有更多的海洋行动自由。在此背景下,制海权斗争地位作用更加凸显,呈现出向“塑造格局+”不断升级趋势,不仅将决定地区格局发展变化,而且在更广范围、更大程度上决定着国际格局走向进程。新兴国家在与传统海洋强国竞争过程中,拥有制海权,就能在战时赢得海上局部战争胜利,维护正当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在平时塑造稳定环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发挥支撑作用,进而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促进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体系早日形成。

获取途径:从“以海制海”向“全域制海+”拓展

制海权目的在于阻止、限制特定海域内敌方兵力行动,进而为己方兵力自由行动创造条件。受技术水平和作战能力的限制,传统海战中交战双方能够用于海上作战的兵力主要为水面水下舰艇,因此夺取制海权的基本途径只能是“以海制海”,即通过运用己方海上兵力打击、摧毁敌方海上兵力以实现对特

定海域的控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导弹武器逐步运用于海战场,使海上作战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与火炮相比,导弹武器具有远距离非接触高精度打击的明显优势。特别是新材料新动力新制导方式的运用,现代导弹不仅打击距离、精度、速度以及智能化程度进一步增强,而且发射平台日趋多样化,既可以装载于各类舰艇进行由海对海打击,也可以装载于作战飞机实现由空对海打击。借助于各类性能更加先进、打击距离更远、突防能力更强的反舰导弹,濒海陆岸兵力完全可以对距岸几十公里至上千公里的海域实现有效拒止,达成“以陆制海”效果。未来争夺制海权,按照“全域制海+”思路,形成“以空制海”“以陆制海”“以天制海”等,在多层次多方向对敌方海上兵力实施综合打击,使“全域制海”更加完备,成为夺取与保持制海权的必然选择。

主战兵力:从“水面舰艇”向“海洋平台+”转变

马汉是“大舰巨炮”至上主义者。他认为海军拥有大舰巨炮对于赢得制海权具有决定性作用。受马汉目标,西方列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纷纷加入海军军备竞赛,企图通过建造优势吨位数量的军舰压制对方。这一阶段,以大口径火炮和厚重装甲防护为标志的蒸汽铁甲战列舰为列强竞相追捧。就在战列舰大行其道的辉煌时刻,航母横空出世为海上作战增加了新的兵力,并悄然改变了制海权斗争的兵力构成。太平洋海战中,美日首次大规模运用航母编队争夺太平洋控制权。至此,航母取代战列舰一跃成为制海权作战的主角。

当前,新技术浪潮此起彼伏,信息技术方兴未艾,人工智能扑面而来,新质作战力量不断涌现。主要海洋国家在不遗余力继续发展包括航母在内的大型海上作战平台同时,也基于体系作战要求,按照“海洋平台+”的理念,组建“航母打击群”“两栖远征群”“驱护舰作战群”以及“无人作战群”等兵力模块,

力求通过灵活多样、高效可靠的主战兵力兵器运用获得海上作战主动权。以航母编队为例,在“航母+舰载机”层面,舰载机类型更多,作战性能不断提升;在“航母+配套兵力”层面,新型驱护舰以及新型攻击型核潜艇等兵力的加入,进一步巩固航母编队在海上作战中的核心地位;在“航母+支援兵力”层面,各类作战卫星、无人作战系统以及能够用于海空打击的其他军兵种兵力的适时运用,形成一体化的海上联合作战体系,控制的海域范围越来越大。

争夺空间:从“海洋平面”向“立体空间+”扩展

以往海战中,交战双方面临主要威胁均为对方水面舰艇兵力,制海权争夺主要在海洋平面进行,舰炮是双方作战主要武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航空兵和潜艇参与海上作战,制海权争夺开始呈现立体化态势,但在规模和影响方面仍然处于初级阶段,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争夺制海权即争夺海洋平面控制权的基本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造卫星、舰载导弹武器、深海装备、电磁武器等逐步运用,制海权争夺空间真正从平面走向立体,向太空和深海延伸。

当前,信息化战争具有信息主导、一体联合、体系作战、夺控综合制权等特点,海上作战兵力面临的威胁不仅仅来自海面,也可能来自太空、空中、水下、深海等有形空间和电磁网络、心理认知等无形领域。如果不能有效应对来自这些全维空间的威胁,包括航母在内的水面舰艇作战兵力就不可避免地遭受打击。立足于战争向信息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必须深刻认识到未来制海权斗争绝不再是单一的海洋平面空间争夺,其作战空间维度将大大拓展,争夺制海权意味着必须要争夺“立体空间+”的综合制权。在有形空间,统筹制海权与制天权、制空权、制水下权斗争,合理部署运用兵力,使制海与其他制权相互紧密协同;在无形领域,牢牢掌握制信息网络权、制心理认知权以及制智权,把信息攻防、电磁网络防护、舆论法律斗争等贯穿争夺制海权始终。

作战方式:从“海上决战”向“海上破击+”嬗变

马汉在论述制海权时说:制海权就是让敌人从海上消失。基于这一理论,运用舰队进行海上决战成为争夺制海权的主要方式。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要求,是因为马汉追求的是绝对制海权,这基本符合蒸汽铁甲舰队时代之前的海上战争实际。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

的日德兰海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大西洋海战、太平洋海战等,也都是舰队“海上决战”。冷战期间美苏两极争霸,双方建设海军舰队基本构想仍然是能够执行远洋舰队决战任务。

如今,信息化智能化海上局部战争形态下,追求绝对制海权已不是必然要求,破击体系成为基本作战指导。与歼灭战相比,通过精确打击瘫痪对方作战体系获得局部的、相对优势的制海权不仅同样能够保障战局顺利进行,而且成本代价更低,更利于控制战局。根据整个战争全局需要,夺取制海权作战需要转变思路,按照“海上破击+”基本要求,灵活运用破击战略通道,破击敌方基地体系、夺控海上要域要道等多样方式组合,才能确保制海权斗争精准、稳妥、高效、有力。

保持时间:从“战时控制”向“平时构建+”延伸

人类对海洋地位作用的认识经历了四个主要历史阶段。一是“兴渔盐之利、行舟楫之便”的初步认识阶段;二是由于生产力发展,伴随着15至18世纪大航海,人类发现海洋是连接世界的战略通道;三是20世纪60、70年代,随着陆地资源趋于枯竭和人口剧增,人们发现海洋是资源宝库;四是21世纪以来,以信息网络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群广泛运用于海洋勘探开发利用,海洋成为国家强大兴盛的必争必保空间。由于对海洋地位作用认识的不断深化,人们争夺制海权战略目的发生了变化,导致对保持制海权持续时间需求也相应变化。

以往海上战争中,获取制海权主要是为海上作战其他兵力提供支援掩护,制海权持续时间从战争开始至战争结束即可。随着海洋战略地位的提升,主要国家需要利用海洋支撑国家强大发展,海上活动的持续时间延长,除了要维护海上航线安全外,还要保护海洋勘探开发、防范海洋利益遭受受损等,对海洋安全期望值增大。制海权已经从“战时控制”向非战争时期提供安全延伸,除海上战争之外,海上兵力预置与威慑、对重要海峡通道的控制以及海洋安全治理都需要制海权作保障。将制海权保障贯穿“平时构建+”海洋活动全过程,成为建设海洋强国的必然要求。



群策集

●战争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它是确定性与盖然性的统一体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我们承认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这揭示了战争虽有“盖然性”,但可以通过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减少“盖然性”,增加确定性。

周密侦察感知减少“盖然性”。侦察感知是前提,综合运用全维侦察感知手段,才能对目标进行立体化实时预警、探测、识别、跟踪和定位。美军“海神之矛”行动看似只是一场动用24人特战小队的快速特种作战行动,其背后却是运用多维侦察手段历经10年追踪的结果。现代作战,首战可能就是决战,要求作战准备更加充分,先期侦察更加细致,充分运用全维布势的侦察感知系统,全面全时全域搜集对手信息,对多源情报进行对比印证分析、去伪存真,有效克服信息的模糊性和灰色性,在情报信息源头上降低“盖然性”。

高效指挥控制减少“盖然性”。指挥控制是关键,作战指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及时分析、认识、权衡各种不确定因素,将有利于己的盖然性转变为必然性,努力减少和消除不利于己的不确定性。现代战争战场空间多维,参战力量多元、影响因素多样,要求指挥员既能运用德尔菲法、战斗力指数法等传统手段估敌,又能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型手段算敌,将智慧、经验、主观能动性

和人工智能技术结合起来,提高判断决策的质量效能,减少因指挥决策失误导致的“盖然性”。

构造实景预演减少“盖然性”。实景预演是依托,通过近似逼真战场的预演提升部队训练实战化水平,提升战斗人员作战素养,进而减少不确定性。训练环境越贴近实战,部队作战的适应性就越强。一江山岛战役前,我军选择了与其相似的大小猫山,演练三军联合登陆作战的组织指挥和协同动作,为此战役奠定了基础。现代作战,组织指挥、作战协同更加复杂,一方面,要依托兵棋、模拟仿真系统进行全过程作战推演,找准影响作战的关键行动;另一方面,要依托训练基地全面打造实战化环境,让官兵置身战地预演磨合,在实战化训练中减少“盖然性”。

及时调整修正减少“盖然性”。调整修正偏误,战争如同棋手过招,需敌变我变、因情应变、以变制变,依据作战行动达成的效果,动态指挥控制作战行动。战争实践证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因应盖然、克敌制胜之道。现代作战体系日趋复杂,体系“熵值”不断增加,作战进程衔接紧、节奏转换快、情况变化大,需要综合运用作战体系分析法、作战重心分析法、作战风险分析法,不断修正作战目标、调控作战进程,确保处变不惊、应对及时、处置得当,在预有计划的准备基础上将“盖然性”降到最低。

科学管理引导减少“盖然性”。管理引导是保障,“盖然性”不仅要靠科学预见,还要靠科学管理、科学引导,这是保障作战体系有序运行的重要方面。随机

如何减少作战“盖然性”

傅婉娟 高凯

事件、态势突变、非线性效应等不确定因素会对体系的结构、状态和运行造成扰动,如果扰动引起的偏差超出允许范围,作战体系就难以有序运行乃至丧失功能。二战初期,德军的装甲师和飞机配合的闪电战,使大批法军士兵发生了心理恐慌现象,甚至成为进而引发溃败的重要诱因。现代战场新型作战武器和新型作战样式等不断出现,更不确定因素,必须对影响作战体系的不确定性因素进行科学预测、实时监控、科学评估和有效处置,减少其消极扰动及影响,保障作战体系有序运行以降低“盖然性”。

实施欺骗诱导减少“盖然性”。欺骗诱导是重要手段,无论优势方还是劣势方,只要使对手的不确定性增加一分,己方的主动就增加一分。因此,通过各种手段加重对已有利的战迷雾、增强对方的不确定性状态、削弱对方降低不确定性的能力,无疑就能直接获取优势和主动。实践证明,欺骗诱导往往能够诱导对手决策、消耗对手精力、迟滞对手时间、分化对手联盟,甚至产生影响博弈走势的效果。现代战争中科技深度融入战略欺骗运筹,结合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通过大量仿真对抗博弈和计算,能够有效增强己方的战略欺骗能力和破解对手欺骗策略,进而在夺取认知主动权中降低“盖然性”。

抢占战略传播制高点

■云利孝 张东尧

挑灯看剑

战略传播,是为实现特定战略利益,动员协调各种资源,向特定目标受众传递信息、施加影响的过程。其主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利益和战略目标,是当前外军认知域作战的重要内容。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的迅猛发展,正使战略传播理念、方法、手段发生深刻变革。

巧用人工智能技术。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已深度融入信息传播过程。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语音识别与合成等技术的进步,有力推动了视频、音频和图像处理技术的快速发展。特别是近年来,国外“深度造假”技术开始兴起,生成的图像和视频信息非常接近真实世界,很容易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人的“社会行为调控”已经开始逐渐地变为一种工程,而不再仅仅是一种口号,“人工智能+”战略传播正成为认知传播前沿领域。

善用大数据技术。大数据技术,主要是指从各种类型的数据中快速获得有价值信息的技术。当今时代是一个数据蓬勃发展的时代。有效的知识被海量的数据和信息淹没,这导致出现了“数据爆炸”却“知识贫乏”的现象。因此,进入大数据时代,更加强调充分发挥数据发掘、知识发现等技术优势,通过智能化、自动化的方式把大量的数据

转化成为有效、有用的知识以及有用的信息、新闻或新闻线索,根据目标受众的喜好进行精准化的推送,使“大数据+”战略传播产生巨大效能。

活用新型媒体矩阵。当今世界,话语权很大程度上依赖媒体。离开了健全通畅的传播渠道,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在美国政府官方话语中,战略传播也被称为“精心运作的传播”。提升国家战略传播能力,应高度重视建设一流媒体矩阵。为此,需要把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有机融合起来,积极整合广播、电视、报刊、网站等多种业态,尤其需要高度重视建好用好新媒体平台,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集群,聚力提升国际传播影响力,“新型媒体+”战略传播正成为认知传播的重要途径。

建好舆论数据。根据传播学“选择性机制”原理,当新旧信息矛盾时,人们常常会感到不安,甚至会由于“恐惧”或不信任而回避,阻碍信息的流传。传播学“回音室效应”也表明,在互联网信息传播中,网民往往倾向于选择倾听让自己“愉悦的东西”,排斥与自己观点相左的声音,由此形成较为封闭的认知空间。在这个认知空间内,原有的信息和观点会得到进一步的印证和强化。因此,对受众的既有认知等信息进行系统性整理和存储显得非常必要。据悉,美国建立有形形色的数据库,为战略传播提供依据和支撑,让“数据服务+”成为其认知传播重要支撑。

下好军事理论博弈“先手棋”

■王雪平 王 崑

谈兵论道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没有科学理论来指导实践,犹如航船行驶没有舵和指南针一样。”当前,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催化战争形态快速演变,新武器新装备不断涌现,军事理论呼唤加速创新。以观念突破为先导。思维观念决定创新维度,创新理论的差异就是思维的差异,加快作战略理论创新必须以思维观念的突破为前提,抢占军事理论制高点必须以作战观念突破为先导。一要敢于否定定论。任何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哲学家狄德罗说:“怀疑是走向哲学的第一步。要创新,就必须对前人的想法加以怀疑,从前人的定论中,提出自己的疑问,才能够发现前人的不足之处,才能够产生自己的新观点。”僵化地认为书本上的就是对,权威说的就是对,作战观念就很难突破。必须倡导敢于、善于质疑的研风,推动作战观念不断突破。二要勇于超越自己。战争实践证明,轻敌或认为对手愚蠢,永远是导致失败的根源。一支军队只有牢记“永远别以敌人比你愚蠢”这一战争名言,方能在不断超越自己中实现一流的备战。对过去战争的经验总结是必要

的,因为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到营养,如果把传统的东西作为一个框框将自己禁锢起来,势必导致军事思维能力和创造力的枯竭。三要善于突破常规。拿破仑说,“给自己一个高得离谱的目标,这样,即使失败了,也在别人的成功之上。”作战观念也是如此,面对当今世界前所未有的军事竞争,战争思维、作战思维,必须积极主动向打破常规发力。要敢于想象,给自己一个“离谱”的作战概念,破天荒设计对手“想不到、看不懂”的战争,甚至是不敢想的战争。

走实技技融合之路。技术决定战术,技术上的进步必然带来战术上的变革和作战理论的发展。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新型武器装备“井喷式”涌现,并快速转化为战斗力,推动军事理论破旧立新。因此,理技融合是作战理论创新发展的不二法门。一是从源头上发力。人才是创新之本。实现作战理论持续创新,需要有一批理技复合型人才。必须加快理技融合人才培养,从源头上解决指挥人才技术素质不硬、技术人才不懂作战的问题。二是从力量上重组。跨领域、跨专业组织研究团队,形成交叉研究力量,是转变传统军事理论研究模式的重要路径。要进一步突破单纯技术密集型研究人才队伍与单纯军事理论研究人才队伍的壁垒,通过理技人员混合编配,从结构上实现

研究力量的融合。三是从评价上倒逼。立项课题的检查,要把参研人员的复合度作为重要因素。作战理论课题,必须能够进行科学计算模拟,理论创新的增长点要基于科技进步和运用科学方法上来,包容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生命科学等先进技术创新。

加强螺旋迭代式创新。作战理论创新,如果不能接续、迭代开发,就可能导致研究成果昙花一现,更不能应用于军事实践。要防止出现军事概念创新“满天飞”,而真正能够走进训练场、战场的寥寥无几的怪象。理论创新必须走“螺旋迭代式”之路,通过“星火燎原式”研究,将闪光的思想火花培育成学术火炬。一是发现思想火花。把散落于不同媒介中的大大小小的创新成果“拎起来”进一步深化研究,将小思想升华为大文章,把小课题发展为“作战概念集合”。二是集智研讨拓展。这是理论研究的第二阶段,也是研究成果升华的重要一步。如,外军提出多域作战概念后,邀请不同领域专家进行了深入研讨,倡导从多域作战力量、多域作战行动和训练联合部队等方面进行思想碰撞,以此深化丰富概念内涵与外延。三是虚拟仿真检验。外军多年来一贯秉承“提出概念——研讨拓展——仿真验证——重塑能力——再提新概念”的军事理论创新链条。其中,仿真检验在理论创新环节中举足轻重的作用,要求